

蒙古寫意

当代人物卷三

巴义尔 著



民族出版社

蒙古寫意

当代人物卷三

巴义尔 著

民族出版社

蒙古寫意
PDG

序



今年3月，当我从作者巴义尔手中接过《蒙古写意——当代人物卷三》书稿时，心中不免有一丝忐忑不安。巴义尔先生于1998年和2001年相继推出了《蒙古写意——当代人物卷一》和《蒙古写意——当代人物卷二》。两本书出版之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对该书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一致认可。有了前两本书的成功，第三本是否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对于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出于对选题本身的喜欢，我接下了这本书，并很快进行了审读。出乎我的预料，审读完毕，自己不仅庆幸并未错过一个好选题，更重要的是书中人物以及著书人他们内心所蕴藏的对蒙古民族的无限热爱以及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为民族大业贡献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于使我产生了将这部作品以最快的速度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种冲动。

蒙古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才辈出，功德卓著，《蒙古写意——当代人物卷三》所记述的正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全书由《军政篇》、《科教篇》、《艺术篇》三部分组成，共收录了43名各行各业的蒙古族优秀儿女，其中不乏有历史人物，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当中有国家领导人、科学家、艺术家、军人、学者、宗教人士，还有早期的起义军领袖、教育家、烈士等等，他们为民族、为国家，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全书以访谈、自述、旁述等多种形式，记述了每一位被收录者的人生旅程，讴歌了他们为民族所做出的光辉业绩，从而增强了书籍的可读性，可以说这是一部各自独立，又是高度浓缩的人物传记。图文并茂，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如席尼喇嘛、达理札雅、嘎达梅林、克兴额等等，有关他们的资料及某些图片，都是作者历经艰辛，经

过多方采访和收集而得来，有的首度与读者见面，极为珍贵。本书所收录的人物从时间跨度来讲有现代的，也有近代的。由于当代人物居多，故作者把书名定位在当代人物卷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

几年前我就认识了巴义尔先生，当时只知道他是《民族画报》社记者，业余时间搞创作，已出版了几部著作，仅此而已。作为蒙古人，他热爱自己的民族，这种情感是从他的骨子里透出来的，有了这种情感，他才愿意，而且不计任何回报地愿意为她去做点什么。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不仅仅体现在他对土地、草场以及蒙古民族生存环境的担忧，而更多的是对蒙古文化的担忧。作为记者，他一方面用手中的镜头捕捉蒙古民族瞬时画面，并使其定格在历史的长卷上，另一方面他也在用笔墨书写和诠释着他所能感悟的蒙古民族久远的记忆。为了书中人物，他踏遍了祖国各地，有时为了采访当事人或当事人亲属，他不辞辛苦，多次前往，他的执著和行动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以至有的后来与其成为了挚友。他是个有心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他继续前行。

作为一名民族文化工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协助作者把这部优秀的作品通过我们的双手呈现给广大的蒙古族读者以及热爱并致力于蒙古民族文化的有识之士。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厚爱与赏识，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与鞭策，也是我们将做好每一部作品的无限动力。如果您在阅读之后也和我一样，有所感动，有所思考，不妨付诸行动，如同历史不会忘记书中人物，历史也不会忘记你们。

乌日娜

2007年6月

PDF



著名音乐家腾格尔作曲的唯一交响乐《席尼喇嘛》。



根据“独贵龙”运动的事迹创作的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剧照，云照光创作。



陶克陶胡(1864—1922)

揭竿而起为哪般？



20年代的蒙古骑兵。前面是俄罗斯教官。

清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陶克陶胡于农历四月初八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塔奔塔虎”古尔班·格日屯（即今八郎乡三家子村）。18岁时，与俊美的耐烈呼姑娘结婚。婚后，夫妻恩爱，和谐美满。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年30岁的陶克陶胡已经有了五男一女。

清末，哲里木盟、郭尔罗斯一带土匪甚多。陶克陶胡17岁时被推举为本地（塔奔塔虎）的会兵（相当于自卫队或保甲兵，自备枪马）首领，自家设有炮台、枪支。当时的郭尔罗斯前旗西部和北部有六股土匪，均被他带领会兵赶跑。从此，当地的民众都尊称他为“陶老爷”。

清光绪年间，清廷对内为了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对外为了补充数以万计的白银外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清朝统治者在东北和东蒙各地推行“立宪新政”，借以“移民实边”（亦称“官垦”）的名义，增设衙门，派遣兵丁，抢占牧场和土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借机出荒卖了本旗的宝巴（农安）后又出卖了阿扬吐（今德惠）的全部土地，就在这一年，齐王晋升为哲里木盟盟长兼兵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齐王又晋为镇国公。为了酬孝清政府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同年又要出卖二龙索口(今毛都站镇额仁索赫村)、赛音胡硕和塔虎荒(今塔虎城一带)。

水是银草是金。失掉了土地和牧场,就等于失掉了饭碗。为寻求生活的出路,塔虎的民众一致推举德高望众的台吉陶老爷为代表,去王府拜见齐王。当时,齐王正在府内议事厅商议出荒之事。王府印务协理借口不予引见,并责骂他无事生非。他欲冲进议事厅与王爷说理,结果被府丁拖进处仗厅,按王爷旨意罚他五十大板,并撵出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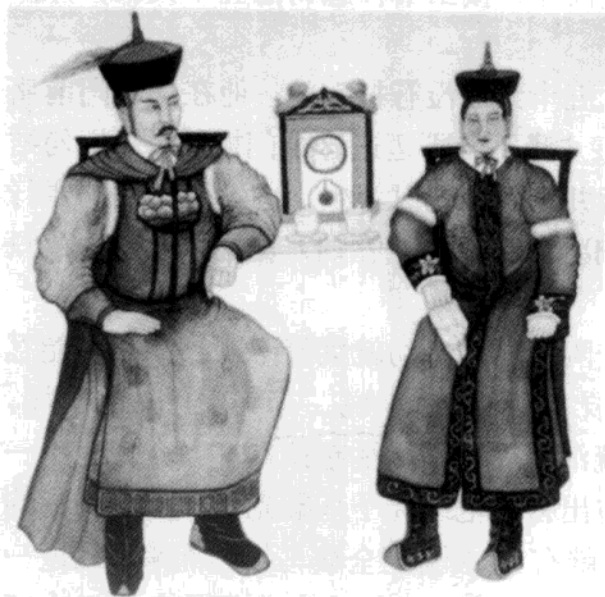
陶克陶胡是个铁汉子,五十大板没有打倒他。他在王府门前痛骂了一场,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不能再迈进这个门槛的。你们勾结军阀,出卖旗地,使人民背井离乡,无以为生,这不是你们的罪行吗?为保护旗地我誓与你们决一雌雄!能胜则万民之福,若失败只我一人不幸!”

人急造反,马急脱缰。陶克陶胡自幼就桀骜不驯,如今哪能忍受这般污辱!他把族兄、义弟、儿子们叫来说:“与其土崖似的坍塌,不如宝石般的爆炸,与其流泪满面,不如举起铁拳。当今,生不一定愉快,死不一定悲哀。拉出去,把地局子全砸光!”陶克陶胡的话,得到众人的拥护,当天就有14人骑上全鞍马投奔而来。经过一段秘密的筹备之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历的九月二十三日凌晨,带上三个儿子和亲族乃旦扎布等22人宣誓起义,朝着二龙索口进军。天亮时,陶克陶胡率众暗下把二龙索口垦局包围起来,然后,派长子德力格尔和次子奈玛腰别短枪,以寻马为名大摇大摆地走进垦局的院落,陶克陶胡就带人马一齐涌进院内。起义军的突然出现,使那个地方官吏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把20名卫兵的枪支弹药统统收集起来,交给了陶克陶胡。

陶克陶胡这样做,目的只是惊动一下王府,恫吓一下清朝地方官吏,达到阻挠塔虎荒的丈放。起义队伍在二龙索口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出发,向郭尔罗斯前旗与达尔罕旗的交界处毛都吐·包德礼客栈(今茂林站)进军。当晚,陶克陶胡率起义军到达了毛都吐·包德礼

客栈，并将客栈包围。这天夜里，起义军把对方的火力几乎消耗尽了。天亮时，陶克陶胡发现从客栈后院越墙逃出十几个只穿着衬衣的人，于是他派起义军把这些人抓了起来。经过查问得知这些人全是日本人。有一个会讲蒙古语的日本人说：“你们国家允许我们在这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并派军队保护我们。”

陶克陶胡对王府引狼入室、吞食牧场的行径极为憎恨。与其丢鞭子，还不如砍断双手！愤怒之中，他把抓到的12名以绘制地图为



陶克陶胡与巴嘎哈屯夫人像。

名搜集情报的日本特务全部杀掉，缴获了30名清军的枪支弹药及军服。此后，陶克陶胡率众朝着卜敦宝力嘎（即今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奔去，以神箭之速一夜之间就将那里的垦务局砸烂，杀了垦务局的官员。

陶克陶胡砸了地局，杀了垦官，杀了日本人，惹下了一场大祸。犹如烈马嘴巴戴上了铁嚼子，缰绳攥在官府的手里。至此，陶克陶胡只好暂时把队伍分散，有的投亲，有的靠友，借此窥视官府动向。

无巧不成书，就在1906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即陶克陶胡起义的第二天，包围毛都吐·包德礼客栈的时候，两名狡猾的通事（翻译）从血泊中爬了出来，逃到了盛京（沈阳）。不久，驻盛京的日本领事馆就照会清政府和哲里木盟盟长，逼迫交出“马贼”首犯陶克陶胡。此后，哲里木盟十个旗都下了通缉令。无奈之中，陶克陶胡只好把人马又集合起来，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春天昼宿夜



行直奔札萨克图旗（即科尔沁右翼前旗），计划进入小兴安岭，占据优势，扩大队伍，以利再战。6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借“以贼制贼”之道，派遣前路统领张作霖的巡防队马、步八营，还有中路管带马龙潭的步兵三营，冯德麟的步兵三营，开始围剿起义军，但终不能得心应手，有时还马踩自家。

在札萨克图、图什业图（今内蒙古科右中旗）一带，张作霖率其降匪巡防队虽然几次亲征，均被陶克陶胡出奇制胜，无获而还。“后依奉天总督徐世昌的奏请，采取了东三省行营翼长、统领兼北洋后路准军提督张勋、帮统武卫左军副督统昆源、吉林督办防剿事宜提督孟思远、黑龙江各军翼长倪嗣冲联合讨伐的政策”（引自日本《蒙古地志》上卷）。陶克陶胡这才感到力弱难支，与白音达赉率领的另一股起义军在洮南府所属醴泉县（即今兴安盟突泉县原图什业图旗游牧地）会合，以壮声势。

时过不久，以张作霖为首的8000清兵，以陶克陶胡为首的200蒙古义军，对垒在醴泉县的德隆烧锅。农历七月二十日的中午，陶克陶胡与联合义军经化装抢先开进德隆烧锅。

德隆烧锅的四面大墙坚固森严，四角的两层炮台居高临下。21日清晨，盛京巡防队、东三省清军马、步各营，配合哲里木盟十旗卫队8000人马，分四路扬尘蔽日而来，层层包围了德隆烧锅。陶克陶胡和白音达赉率领的义军以一当十、十步一岗地坚守在墙下，四角炮台就是火力的焦点。清军虽然伤亡甚大，因人多势众仍无退却之意。

清政府公布了逮捕陶克陶胡者的奖励办法，即“按其肉赏金，按其骨给银”。清兵为了逮捕陶克陶胡等人，庆功领赏，舍命奋战。当然，愈勇者死于



陶克陶胡像。

枪下愈多。陶克陶胡更懂得“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之理。此时，清军也识破了他的“诈术”。于是，开始撤离墙脚，略有后退，但仍不解围。战斗继续着，四个昼夜已经过去，估计打死打伤清军已有七八百人。

第五天夜里，猖狂的清军变得消沉起来，重新策划着新的战略。陶克陶胡义军借机得以喘息，并制定好了突围的方案。第七天夜里，义军做好突围前的一

切准备。陶克陶胡的长子德力格尔、次子奈玛把一匹骗马牵到南大门的门洞里，从里院背出一挂鞭炮，绑系在鞍板上。与此同时，门楼和四个炮台都响起猛烈的枪声。德力格尔点燃了鞭炮，开门猛然把马放了出去。受伤的骗马像惊弓之鸟带着火光声响冲上清军的阵营。清军以为义军想正门突围出来，一阵慌乱之后潮水般涌向堤岸，向秃尾巴马惊跑的方向追去。



陶克陶胡塑像，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一场声东击西之后，陶克陶胡率众从后院挖墙突围出去，直向嫩江东岸的杜尔伯特旗进军，而后于9月底进入苏鄂公旗（即科尔沁右翼后旗），从而登上了人烟绝迹的索伦山，暂时安身喘息。率众以猎为生的陶克陶胡首次避居索伦山，史称“一上索伦山”。

时光在马背上流逝，大仗屈指可数，小仗无计其数，弹指间一年已经过去，又来到了触目心惊、令人思乡的秋末。于是陶克陶胡与部众商议，决定返回故乡探望亲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天，陶克陶胡与白音达赉分手，带五十余人，避开帮带玉春的堵击，于10月25日到达距塔虎城大约六十华里的雅玛吐，并派出两个儿子先行探听消息。此时，陶克陶胡的院落，已经到了“鸡从梁上飞，兔从狗洞入”的地步。陶的妻子、儿媳等家人已经全被逮捕，被押到大赉厅的监狱。无奈之中，胸痛如绞的陶克陶胡只好率众撤离。途中，他遇到一对行迹可疑的年轻夫妇。经审问，男的是大赉厅的官员，对逮捕陶克陶胡家眷一事了如指掌。为了泄忿，他先杀了年轻的官员，并让他的妻子转告大赉厅的长官：“若不释放我的家属，三天后我定要砸碎他们的衙门！”

据说，这个女人回到大赉后，转而上告到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衙门惩办了大赉的县官，释放了陶克陶胡的家属，但陶的四子班查拉克其和五子朝乐蒙却被官军押到盛京黄寺，从此杳无音信。

此间，巡防队中路帮带玉春又率大队人马包抄而来。雅玛吐之战，陶克陶胡义军因人困马乏而损失惨重，三子努特克图牺牲，最后只剩下14人、9匹马、200发子弹。没办法，陶克陶胡在巡防队的尾追下，只好带义军经科左前旗向索伦进军。

进军中，陶克陶胡的队伍又与清军黑马队遭遇，清军的人马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不久，博和（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聂提督率领700清兵再次围剿上来，陶率众在察干木仁附近迎战，并将清军击败，然后朝着巴林左旗进发。此时，吉林、博和、奉天的军队，热河、昭乌达盟八部十一旗、锡林郭勒盟五部十旗、哲里木盟四部十旗的军队全部调动起来，并表示：捉不到陶克陶胡绝不收兵。陶克陶胡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决定右转回师，二上索伦山。

光阴流水，以日待月。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进入索伦山的义军终于熬到了农历三月。此时，再度与白音达赉联军的陶克陶胡决心南下。白音达赉是个善战的武将，但他的部下纪律败坏，抢劫成风，而他却任其所为。陶克陶胡对此恶习进行劝说，但却无济于事，因此，陶克陶胡只好与白音达赉背马相离，分道扬镳。

5月，义军转战来到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境内时，陶克陶胡从好友桑宝处得知，大批清军决定在5月中旬进行围剿，锡林郭勒盟的蒙兵也要在西北方向阻击。为此，他不得不向索雅尔吉山转移。7月，陶克陶胡再次出山，带领义军第二次南下，留宿在王老买卖大院时，被奉天、吉林、博和等地的清军和附近七个旗的蒙古兵共五千余人包围。

此次战斗持续了三个昼夜，共击毙清军五百多人。适值第三夜里，风雪交加，一片漆黑。陶克陶胡义军跨上战马，打开大门。义军共有11支匣子枪，向埋伏在大门两侧的清兵开枪，打得清军不敢抬头，义军的战马就从清军的头顶飞驰而过，却没有一人死亡。清



陶克陶胡与卫兵。



军在混乱中追剿，自相冲撞，落马者甚多，死于蹄下者也不计其数。陶克陶胡自王老买卖突围出来以后，因为清军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所以再不能南下了。于是，掉转马头，又向索伦山奔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冬季，张作霖率众穷追陶克陶胡至大兴安岭的索伦山，像群狼觅食羔羊一样蜂拥而来。陶克陶胡部下至此虽然增加到六十余人，但与500清军相比还是十分悬殊的。于是，他命令一部分人继续抵抗，掩护主力安全地撤退出来，向西南方向索伦山深处避去。清军跟踪追击，双方交战了一整天，清军未遂而归。陶克陶胡判断，除陶好木吐之外，此地别无村落，清军定然在此整休。据此，夜袭当是上策。然而，清军统领张作霖自以为气贯斗牛，以为马贼若来，自是以卵击石。

自古就是“骄兵必败”。清军正在吃饭之时，陶克陶胡等四十余人猛烈开火。清军没有防范，顿时乱作一团，并互相践踏，除寥寥几人侥幸逃出，其余全部毙命。第二天，当地人民来祝贺陶克陶胡的胜利，他们说：“驻寨的清军是五百多人，今天早晨逃走一二百人，张作霖也夹杂在逃兵之中。”

清兵吃了陶克陶胡的这次夜袭之后，一想陶克陶胡就胆战心惊，而人民则以民歌的形式赞颂陶克陶胡英勇无敌的动人事迹。从此以后，清军的追剿也迟缓下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陶克陶胡率义军决定回索伦山过冬，史称三上索伦。“哈萨尔王的弓，陶克陶胡的箭”，流传在郭尔罗斯的这则谚语，无疑是对这两位人物的肯定。陶克陶胡的起义，无疑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四年来，他们三上索伦山，又三次南下，铺天盖地，枕鞍而眠，餐冰卧雪，兽皮为衣。清军仍在日夜围剿。陶克陶胡与军师乃旦扎布前思后想，最后决定率众进入喀尔喀蒙古（即今蒙古国）以求喘息。在进入外蒙古的时候，陶克陶胡义军又遭到大库伦（今乌兰巴托）及车臣汗盟一带的蒙古骑兵的追剿，战斗中长子德力格尔中弹受伤，后摔下马背致死。无奈之中，他才产生了去俄国避难的念头。

宣统二年（1910年）春，陶克陶胡率义军48人一路与清军和蒙

古兵击战，这才曲径奔向俄国贝加尔湖东岸布里亚特蒙古人居住的地方——苏胡勒·塔青。

宣统三年（1911年）冬，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陶克陶胡把随从和家属留在苏胡勒·塔青，只带乃旦扎布、哈达、拉斯格、那顺陶克涛四人，来到喀尔喀蒙古的首府库伦。同年，陶克陶胡受封为“卓理克图·巴特尔”（即刚毅英雄）的称号，并委任他为兵部司官。

民国元年（1912年）春，陶克陶胡等将家眷从苏胡勒·塔青接到库伦。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称帝后，对内蒙古王公论功行赏，大封爵位。袁世凯通过驻外蒙古大员陈禄转给陶克陶胡的亲笔信中说：“……猛虎岂可久居无食之山林，你可尽快归来，享受高官厚禄，并令你管理旗务。”然而，陶克陶胡对此并没有为之所动，他说：“只要我的脑袋还长在肩膀上，就绝不屈服！”

1919年，蒙古的革命领袖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即崔保善），发展革命秘密组织时，陶克陶胡和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去苏联请求援助期间，北洋军阀和白俄恩琴匪帮搜查革命人士时，也搜查到了陶克陶胡的头上。后来，“苏赫巴托尔、乔巴山领导外蒙古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占领了库伦，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陶克陶胡虽有为革命事业尽力服务的决心和愿望，但由于病情严重，已经不能参加任何工作了”（引自《陶克陶胡事迹》，义都合西格整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陶克陶胡由于长期受病魔的折磨，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病逝于大库伦（今乌兰巴托）的公寓里，终年59岁，其遗体被风葬于达兰·达胡尔岩层之上。

（本文由陶克陶胡的家乡、吉林省松原市政协副主席、蒙古族作家苏赫巴鲁先生撰写）



会师处，即东界通蒙长清
二只眼平谷，因故金府县
降人古寨内于西全，初十
共土寨院前村通蒙土寨
转战，激战大捷一之同
战三十二只眼，通蒙，双
雄战和只三只眼，金火场
一寨要人并战于平谷，自
率各本我战作酒口

虎日乐巴根 (1926—2000)

骑兵军中一虎将



在边境地区视察。

我在采访这些蒙古族人物时最痛心的事就是刚要去采访时，这个人物却一去不返了。我在1999年冬天见了一次虎司令，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回忆录，答应写好后第一个让我看，并且约好下一次再访。当我第二次要去采访时，却从报纸上看到虎日

乐巴根同志逝世的消息！这次病来的很突然，家里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夫人痛苦得无法面对这个现实，我也无法在这个时候继续采访……

熟悉他的人们说，那真是“虎司令”啊。不光是他的名字前有个虎字，实际上作为一个骑兵军官，他的确是个虎虎生气的一员骁将，直到升为内蒙古军区副司令，直到他被病魔夺去生命，他引以为豪的军人生涯才算结束。

我1926年出生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高林台屯，那里的大



指导。

部分地区是农区，少部分是牧业地区。每年腊月二十时，全屯子的蒙古人都穿上体面的衣服到庙上共同吃一顿大锅饭，然后摔跤，唱歌。腊月二十三时供火盆，农历三月时祭敖包，端午节前每人要喝一口新打的井水等等。